纂修清史

在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座谈会上的讲话

戴　逸

女士们、先生们：

今天邀请大家到北京讨论清史的体裁和体例问题，邀请的主要是北京、天津、华北、东北、西北的专家学者，分两次开，我们这是第一批，隔两天以后，第二批也在这个地方，还要开一次。另外，四月份准备到上海开会，可能要征集三四百人的意见。

刚才传达了岚清同志的长篇讲话，这个讲话高瞻远瞩、内容丰富深刻，对我们修史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。我想跟同志们着重谈一谈清史编纂中的一些问题。共分成三个部分：第一个部分是编纂清史的缘起，很简略地说一说清史编纂的来龙去脉；第二部分讲清史的体裁体例问题，我着重谈这个问题，今天请大家来主要也是讨论这个问题，清史体裁体例难度相当大，怎么办；第三个问题是清史的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，这个问题也简单谈一谈，因为我们还要专门开另外的会来解决这个问题，三月份准备在北京召开。

现在我讲第一个问题，编纂清史的缘起。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个传统，就是“易代修史”，所以我们中国产生了二十六史，这二十六史构成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，典籍浩瀚，内容丰富，哪一个国家也没有这么多的历史书，也没有这样连续不断的历史记录，这应该是我们的骄傲，是我们民族的荣耀。

现在清朝已经推翻九十多年，但至今还没有一部理想的大型的历史书。当然有《清史稿》，但《清史稿》有比较严重的缺陷，这个就不谈了。所以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董必武同志在解放之初就向中央建议修清史，这个意见得到了毛主席的赞成。1959 年，周恩来总理委托吴晗同志起草一个清史编纂的规划，当时吴晗同志找我征求过意见，吴晗同志有很多设想，跟我谈了一下午。但是由于正好是三年困难时期，这个规划没做出来。到了 1965 年，文革的前夕，周总理又委托周扬同志召开中宣部的部长会议，部长会议上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，由 7 个人组成，郭影秋是主任，他是人民大学校长，也是明清史的专家，其他人是关山复、尹达、刘大年、刘导生、佟冬，还有我，七个人的编纂委员会。人民大学党委向我传达了这个决定，并且决定要在人民大学内设立清史研究所。当时房子都看好了，突然一下子文化大革命发生了，批判海瑞罢官，编清史的事又流产，不仅流产，而且成为郭影秋的罪状，也是中宣部的罪状，为什么你们要搞清史，你们是要干扰文化大革

[收稿日期] 2003 - 2 - 28
[作者简介] (1926 —)，男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；北京 100872

命，要反对姚文元当时发表的批判吴晗的文章。这样，编清史的事情又化为泡影。但是，郭影秋同志始终坚持要搞清史，他对于清史编纂功不可没。在文革后期，人民大学解散了，他就成立了一个清史研究小组，原有的清史人员不动。他向吴德谈了，吴德表示同意，保持了清史研究小组的建制，放在北京师范大学。

到了文革以后，邓小平同志又转了一封人民来信，这封人民来信建议编写清史，转到社会科学院。看来清史编纂又要提上日程了。当时在搞科研规划的时候，曾经着重考虑要搞清史，而且要再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，没有成立起来，又整整拖了 20 年。一直到 2001 年，旧事重提，学术界各方面呼吁编纂清史，历时两年，到 200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清史项目，由中央 14 个部委组成领导小组，可见中央的重视。又于 2002 年 12 月 12 日成立编纂委员会。

50 年来清史编纂经历了酝酿、讨论，几起几落。我从 39 岁第一次当编纂委员会最末一个成员，经历了很长的道路，其中的曲折一言难尽。现在大环境好了，国家在政治上安定，财政上也比较宽裕了。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，财政上还拿不出钱来，当时整个国家社会科学规划的资金也没多少，怎么来支持这个大工程啊。现在财政上比较富裕了，能够投入更多的财力、物力进行文化建设，清史编纂的启动，也是标志着国家把文化建设提到一个更重要的地位。建国以来，哪一项工程是经过四个常委批准的，哪一项工程是由 14 个部委组成领导小组，可以说这是个最大的文化工程。同时，我们的研究条件也比以前好得多了。开始吴晗同志找人研究根本找不出人，没有人专门搞清史，当时只有很少的几位老先生，像郑天挺，他当时还跟任继愈先生研究过。现在我们的研究成果多了，研究队伍壮大了、成熟了，研究的资料也出版得很多了，各方面条件都更好了，所以中央现在批准清史编纂工程启动，是非常适合时宜，是非常重要的决定。这对我们史学工作者来讲，是个大好事。一个史学工作者，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国家修史，这是人生的幸事。刚才传达的岚清同志讲话里面讲，一个人一辈子能给国家做这样一件事情也可以心安理得了。我觉得这是语重心长的话，确实是这样。

我算了算，我们中国历史上，近 600 年来国家修史一共有四次。从 1368 年朱元璋洪武元年打下大都，他就立即下令修元史，这是第一次修史；第二次是顺治入关后的第二年，下诏修明史，但是明史一直没有修，因为打仗，没有安定的大环境，他也修不了，直到康熙以后才修，修了 90 年到乾隆时才修成；第三次是民国三年（1914），北洋政府大总统袁世凯下令成立清史馆修清史；第四次就是 2002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启动清史工程。600 年四次修史，这样的盛举是百年不遇的。我们有幸生在这个时候，能够赶上修史，对于史学家来讲，确实是一件幸事，非常令人鼓舞、高兴。能够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国家修史确实是心安理得。

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就要启动了，修一部什么样的清史，清史的体裁和体例，发凡起例，事关重大，希望能够广泛地听取意见，希望百家争鸣、集思广益，提供各种各样的意见。只有充分发扬学术民主，吸取大家的建议，才能够把清史修好。

第二个问题，就是清史的体裁体例问题。为了便于讨论，我们就要谈点初步的设想了。我们的目标是以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以及“三个代表”的重要思想作为指导，写一部内容丰富、史料扎实、观点正确的大型的历史书。岚清同志在讲话中也非常强调指导理论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，本着以史为鉴和古为今用的原则，既要尊重历史事实，又要反映时代精神、既要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，又要勇于进行学术创新、既要着眼于中国历史的发展，又要联系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，这样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、高质量的清史。篇幅暂定为 3000 万字，字数多少还可以讨

论，时间 10 年左右。这样一个篇幅比《清史稿》多出 4 倍，时间比它短 4 年，所以时间紧、任务重。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不是轻而易举的，有很大的难度，所以我接受这个任务也是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我长期以来从事清史研究，现在修史工作居然能够实现了，当然很高兴，但是我的压力非常大，我每天都在想怎么能修好。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工作，必须认真对待、团结协作、集思广益、专心致志，现在清史启动碰到的第一个大问题，就是体例体裁。我们召开这次会就是向同志们请教，是拜师，还要开多次的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。因为体裁、体例对于写作这部大型的史书来讲是事关重大、非常重要。凡是一项现代的大工程必须首先进行设计，工程未动，设计先行，没有设计的施工是盲目的施工，是非科学的施工，必然要影响工程的质量，边设计边施工是不行的。清史工程不同于一般小的工程，要有一个很好的设计，清史的设计师就是今天到会的全体同志们。任何一个人考虑不了那么周到，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能够设计这么一部大型的史书，必须要广泛地征求意见，集中群众的智慧。体例是否定得适当，设计得好不好，必然要影响我们的制成品，成败利钝，关系重大。所以，我诚恳地希望听到同志们的声音，听到同志们的意见、建议。我们发的调研大纲同志们都看到了，希望大家能够按题回答，提供意见，当然也可以自己另外构思一套。大家充分地发表意见就是对修清史的关怀、支持，就是参与清史修纂，我们欢迎有更多的人踊跃地来参与这个工作。建议将来是否都采纳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，但是我们准备把这些意见基本上都要保存出版、存留后世，以便于将来修史参考。当年修史怎么修的，现在《明史》已经不太清楚了，《清史稿》还有些东西保留下来，也不很多，《元史》就更不知道怎么修的，他们当时讨论了什么问题，碰到那些问题，我们都不清楚了，这是史学史上的遗憾。我们希望这次能把同志们的意见都保留下来，传诸后世。

我们将来写出的清史是什么面貌，现在还很难说，工作还没开始，但是不妨有些初步的设想。体例既要继承，又要创新。继承无非是继承传统，传统史书的体例无非是纪传体、编年体，比较新的是二十世纪的章节体。

传记。历史是人们创造的，离不开人物。一部史书似乎应该有传记。但一想传记，很多问题就产生了，首先 300 年历史(包括关外的) 要写多少人呢？据说《清史稿》写了 8000 人，我没有统计，后边那些列女传、忠义传都只有名字了，没什么记载。章学诚曾经批评纪传体，说纪传体的弊端就是“人至千名，卷盈数百”。那我们应该写多少人？这是个问题。二十四史大多是类传、群传、合传，把人物分成类型，儒林、文苑、畴人等，大臣也是分类如军机大臣、部院大臣等，我们怎么办，分不分类？现在我看 20 世纪出版的传记史书按照人物的生年排下来，这倒是简单。那么比较起来哪一种好呢？我们应该用哪一种体裁？这些问题在写之前都要解决。尤其是跨朝代的人物如何处理。如《明史》里写了史可法、何腾蛟、瞿式耜，《清史稿》写的是郑成功、李定国、张煌言，同样是南明人物有的在明史里写，有的在清史里写，那我们在那里写呢？你把史可法也拿到清史里来写，可他是明朝人，他的事情都在明朝，进入清朝他很快就死掉了，所以他不放在清史里也是说得过去的。但是，如果说按人活得时间长短来取舍的话，那活到哪一年该在清史里，活到哪一年该在明史里，这些问题很不好处理。还有清末民初，邹容、秋瑾、陈天华、徐锡麟、吴樾这些革命烈士，都在清朝末年死了，并没有活到民国，将来的中华民国史里没有他们，《清史稿》里也没有他们的传，我们要不写的话，这些烈士就不会有传了。更麻烦的像袁世凯、徐世昌、岑春煊、张謇这些人，清朝他活了一长段，有很多事情，民国他也活了一长段，也有很多事情，谁搁在清史里，谁搁在民国史里。我曾经征求同志们的意见，我说孙中山怎么办，他们说孙中山清史里当然应该有啊。他在清朝革命了

很长时间，清史不写孙中山怎么行。但搞民国史的人又说，孙中山是民国大总统，怎么写到清史里面去了呢？所以这种体例问题是很麻烦的，我也想不出好办法来解决，还要请教大家来集思广益，定一个什么例。体例中的体就是整个史的结构，例就是规则、规范，例定下来就好办了，我就按照例来执行。例要定得不适当，自乱体例，就不行了。孙中山如果不写，那宋教仁、黄兴怎么办，蔡锷怎么办，他们到中华民国初年就死了，民国年间没多少事情了，这样的有一大批人物，怎么办才好。

志。志的问题也非常多。志是典章制度或专史，《清史稿》列了 16 个志，有的志我们怎么写，如天文志，因为天文档案没有保存下来，没有档案写什么呢？当年倒是有外国传教士观测天文的很多记录，但是没有传下这些资料来。这门学问又非常深奥，都是中国传统的一些术语，都看不懂。我看天文志觉得头都胀了，简直不知道说的什么，怎么写呢？而且天文志讲的自然现象，我们历史写的是社会历史，它不是社会历史我们还写它干嘛，但是二十四史都有天文志，如果没有，人家就会说你们怎么把天文志割掉了。时宪志是讲历法的，这个志要不要。礼乐舆服应该是社会史中重要的东西，但《清史稿》里讲的都是庙堂音乐，清代的民间音乐有什么资料呢？是空白的，没有人研究。设哪些志，不设哪些志。《清史稿》16 个志，但到近代以后，近代工业产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它就一个志，叫“交通志”。“交通志”里面包括铁路、轮船，矿业没有，开平煤矿、开滦煤矿都没有，只写了轮船招商局、京汉铁路、邮政电报，显然不能反映中国近代化的开端。我们只写交通志显然不够了，那么增设什么志呢，怎么增设？工业志、手工业志、铁路志，志太多了，增设起来也不得了。譬如艺文志也很伤脑筋，清朝一代的文献多得不得了，收不胜收。《清史稿》按照经史子集写了 4 卷艺文志，收了很多书，很厚。但是后来的人觉得太少了，清代的著作远远不止这些，所以这个也来补一段，那个也来补一段，最近山东王绍曾先生写了一部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》，收了 50000 种书，煌煌三大巨册。清史里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包括进去，篇幅难以容纳。那艺文志怎么修呢？都收进来容纳不了，挑选一些收入，挑选哪些呢，哪一部是好的？我们没有这个本事来挑。那么不要艺文志了，可从前传统史书里都有艺文志，新修的清史里没有艺文志叫什么史书啊！这又是个难题。兵志也是这样。因为清朝军队的制度特别复杂，开始的八旗、绿营、防营（湘淮军），后来的新建陆军，还有北洋水师都是非常重要的，都得写，但一部兵志里能容纳得了那么多内容吗？一个八旗制度就可以写一本书，湘淮军也早有专书了。其他新的志有哪些要补呢？比如说灾荒似乎应该有个志啊，戏曲中京剧是国宝，是清朝产生的，我们应该给它立个志。另外书画立不立志啊。要立的话太多，不立的话又有缺漏。

表。表的好处是把复杂众多的人和事立表以明之，使人看起来一目了然，不用很多文字。《清史稿》列了 10 种表，像皇子世表，把皇子的儿子、孙子、重孙名字全部都列在里面，表的人数之多，眼花缭乱，非常复杂。公主表倒是比较简单，只写公主本人，公主的儿子就不写了，写公主嫁给谁，什么时候出嫁，什么时候死。藩部世表与列传里的藩部列传，好象两者都是讲人的，有点重复。所以，哪些应该改进，哪些应该保留，哪些应该去掉，哪些应该新增。譬如人口，人口是个大问题，要不要个表，是应该立志还是立表，这些都是问题。人口要立志的话写什么，如果仅仅是讲数字可以列表，如果讲人口的流移，表就不行了。再譬如土地，清朝的耕地面积是最混乱的，简直无法统计，数字的记录都不能让人相信，能不能列表，谁能弄清楚它。财政上收支数字有定，可以列表，但其他细目就列不出，关税倒可能能列表，特别是后来对外贸易的关税 60 年代以后有详细的统计，这是应该列表的了。所以，要搞哪些新表呢？需要考虑。

图录。二十四史里没有图，但是古代我

们有图，“河图洛书”嘛，萧何跟着刘邦进咸阳，打下秦的都城，“收历令图书”，可见秦朝库里有很多图。后来二十四史里没有图，可能是印刷条件不行，竹简上怎么弄图呢，后来木版书图也不好刻，是不是这个原因，这是我的想象。但是郑樵是主张有图的，章学诚是力主有图的，他们认为正史应该有图。章学诚在“和州志”这篇文章里批评司马迁，他说“司马迁始创十表，后世相承，志表愈繁，图经渐失”，他认为司马迁没有搞图，所以以后的人跟着他的传统都不搞图了。我看也不能怨司马迁，他不搞图，别的人为什么不搞图呢？我估计可能跟印刷条件有关，当时没有很好的图，也难以把它刻印。但是，清代不同了，清代有很多非常精彩的、精美的图。我觉得我们对图没有研究，因为以往史书里没有图，研究史学史的人也不研究图。图有几种类型呢？我现在能说出来的一类是地图，清宫里地图是大量的，可能有上万幅，包括各种地图，像疆域图、作战地图、山脉河流图、城市地图；第二类是人物图，清朝的人物图也是非常多，很多学者都有图像，都是当时画的图像，是不是他的原貌那另外说，但时间是当时画的；第三类是风俗图，像“南巡图”、“盛世滋生图”等都属于风俗图；第四类生产活动的图，像耕织图、制造瓷器、制造井盐等的图；还有少数民族图像，像职贡图等。清末还有照片，十九世纪 60 年代以后就有照片了，拍了很多照片。以前对历史人物长得什么样是根本不知道的，以后有了照片就清楚了，照片更加能够反映人物的形象。但是那么多图，怎么挑选、分类、使用，我觉得还缺乏研究。如果我们要图录的话，我们要大力地收集这些图，研究这些图，哪些是典型地反映清代生活的，因为那么多图，我们不可能全部把它印出来。增加图录可以说是在体例上的创新，能够更生动、更形象地反映历史真实。而且今天的印刷条件我们可以保证印得好，不像从前用木版刻，容易失真。

还有体例中最重要的问题，能否增加一个部分叫总叙，这个名称还可以考虑，综合地叙述 268 年的历史。以往纪传体的严重缺陷就在大事情分列在各个传记中间，所以章学诚说纪传史书“类例易求，而大事难贯”。为了纠正这样的缺陷，能不能加一部分总叙或者叫综述，吸收章节体的优点，加以改造，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几个大类的事件综合起来加以叙述。这样的体例是罗尔纲先生、白寿彝先生创行的，我觉得这个体例是比较好的，能不能加以继承、改进，用比较少的篇幅来叙述 268 年的历史大势。要求内容系统、史实准确、观点鲜明、文字流畅，但不要求很详细，作为 3000 万字清史的大纲。岚清副总理讲到宜精不宜多，我们将 3000 万字减到 2000 万字，甚至 1000 万字大家也没法看，再减就不行了，刚才我说过，内容多，表现的字数要少，欧阳修说过，“文省事增”是写史的原则，这是一个矛盾。岚清同志讲宜精不宜多，又要有可读性，总叙部分能不能写成一部比较精简的、可读的历史书。所以，把总叙部分一方面作为全书的大纲，一方面作为简明本。这部分能不能有？也有人认为这样的搞法成为杂凑了，所以请教大家究竟怎么办。

还有一种设想，就是抛开纪传体，用章节体来写，基本上不用传统的体裁，就用萧一山的办法来写。但是章节体有个大的缺陷，它的历史容量比较小，怎么样能够把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生活安排进一种单一的框架。比如人物怎么写，就不可能写 8000 人物，连几十个人物都很难写，重要历史人物可以单辟一节，但其他人物怎么装进去呢？是不是要写补充的传记呢？那又往纪传体上走了。萧一山的书中还有表，那就又回到了纪传体的路上。当然这也不失为一种路子，就是以章节体为主。

清代还有一种现象，是两个政权的对峙，清初有南明，清代中叶有太平天国，康雍乾时期有准噶尔，一个中国国境里有两个政权长期的对立，如何处理。我们只给洪秀全、杨秀清立个传就完了，南明就像《清史稿》、《明史》那样处理，给史可法、何腾蛟立个传就行了，这当然也是种处理办法。但

是，我看房玄龄等编的《晋书》中有种体裁叫“载记”，这个名称不是他们发明的，他们用“载记”记载了五胡乱华时的对峙政权，达30卷之多，占《晋书》很大的篇幅，因为它是适应割据局面而创造的体裁。我们能不能也学习一下，搞一个“南明载记”把整个南明三朝的历史连续记录下来，用“太平天国载记”把太平天国的制度、机构、政策记录下来。如果南明和太平天国立“载记”，那么准噶尔是在康乾时期多年对峙的政权，苏联的史学家写了《准噶尔汗国史》，我们能不能也给它立一个“准噶尔载记”呢？它是个中国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，当时平定了它才能统一中国，这是非常关键的政权，中国现在能够有这么大的地方，就是打败了准噶尔才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它有自己的制度和官属，和清朝完全不同，现在连噶尔丹的传记都没有。立“载记”也有人反对，说二十四史里这种体裁少，对峙政权可以一笔带过，不用载记，这个问题如何考虑。

总之，主体工程3000万字的清史，设计什么样的部件、要多少部件，是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决定全书的面貌，不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开不了工，不知道怎么写。还有很多例、规范，如引书怎么引，都要有统一的规范。所以我要求体例组拟订一个编写的手册，要按照编写手册来写，如引数字用阿拉伯字1、2、3、4、5，还是用中国字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都得统一。要有统一规范，要设计好部件，整个清史的结构要考虑妥当。今天找同志们来，就是商量这个大计，要有什么样的结构和统一规范。

第三部分讲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。整个清史是个系统工程，不仅仅是3000万字的主体工程，还有其它的工程。为了保证修史的质量，也为了抢救、保存清代的历史文化遗产，我们准备较大规模地收集、整理、保存、出版清代的档案和文献。所以，围绕着主体工程我们准备搞一系列的基础工程。我打个比喻，好象我们打造一艘航空母舰，光是一艘航空母舰不行，还要有许多驱逐舰、巡洋舰、潜水艇，形成一个战斗群。将来出来的不仅是3000万字的清史，还有很多刚才岚清同志讲的副产品，我用的名称是基础工程，因为这是我们修史的基础，形成一个战斗群。因此，现在编纂委员会正在对清代的文献档案进行调查，这个工程也已经启动了，下个月要开文献方面的会。对于那些对编史有价值的，或者是其他珍贵的历史资料进行抢救。现在的资料太多了，分散在各地，保管不善，有的档案已经都板结起来，揭不开了。我们有责任尽我们的能力抢救文化遗产。譬如第一历史档案馆一千万件档案，另外分散在外地的还有一千万件档案，虽然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年来整理了很多，但是总的看来整理出版的还是太少，我们想投入一些力量加快档案的整理，至于能够投入多少力量，要看中央的拨款、我们的人力等。现在初步考虑，朱批奏折要出全，目前已经出了康熙、雍正、光绪，乾隆到同治以及宣统还没有出，数量多得不得了；粮食雨水条子是全国各地每个月向中央上报粮食价格，稻子多少钱、麦子多少钱，每个月都还要报下雨了没有，下了几寸雨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范围、长时段的非常好的经济资料和气象资料，现在堆在档案库里，我想把它弄出来，但是数量很大。全世界各个国家肯定没有这样珍贵的档案资料，弄出来以后，我们对300年的气候至少有个比较好的了解。但可能编清史用不上了，用不上也没关系，造福后代，应该搞，不搞的话恐怕再过几年就损失了；另外是庚子新档，庚子赔款时谈判的档案，比较全；还有晚清外务部的档案，因为外交档案前期都有，后期缺乏，这个档案也是非常完整的，而且不仅是讲外交，还讲了很多内政问题，很重要；还有像盛宣怀档案，大家都知道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化道路上的一个先驱者，招商局、电报局、华盛纱厂、京汉铁路、交通大学、中国通商银行都是他创办的，搞近代企业他在中国首屈一指的。他的全部3000万字档案都在上海图书馆，想用这个机会，投入力量把它整理出来。还有很多满文档案、蒙文档案、藏

文档案、维吾尔文档案、托忒文档案等，我们不可能全部整理，藏文档案的数量就相当于第一历史档案馆，所以我们的宝贝多了，清代的文献从来没有整理过，我们干下去，恐怕好几辈子也干不完，只能开个头。

还有清人诗文集，前几年才弄清楚有 4 万种，岚清同志说看到李叔同的资料吓一跳，我看到 4 万种也吓一跳。4 万种如果抢救它的百分之一就是 400 种，400 种的字数估计就要上亿。我想弄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，就要看有没有力量，尽量利用这 10 年的时间多干点事。3000 万字的清史是要保证的，全力以赴，不能够冲击主体工程，钱要保证、人力要保证，史学界还有很多同志，我希望同志们都来投入抢救文献的工作。当然还要看钱拨得多少了。我也希望各位同志提供哪里有珍贵的资料，我们将来能不能搞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，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下究竟有多少珍贵资料，将来根据人力和财力来进行抢救整理。

总之，我们要以相当大的力量来投入整理文献档案。当然，文献档案工程太大，我们 10 年是不可能做完的，根据我们的力量，分别轻重缓急，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。这样才能对得起中央交付给我们的任务。

另外，清史工程可能还会有一些副产品。例如，清史的分歧问题很多，讨论也很热烈，如太后下嫁、顺治出家、雍正夺嫡，分歧和争论多啦。我们能不能学习司马光搞一本《清史考异》，把这些已有的争论，已经解决的问题做一些介绍，另外一些新的问题有争论我们收纳进去。另外，我们要不要搞一本《清代人物大辞典》，因为我刚才说了，人物不可能写很多，其他人怎么办呢？能不能搞一本辞典。这都是辅助性的工程。

现在国家能够给多少钱，还不知道。国家拨经费是很慎重的，要经过估算、论证、批准，要做 10 年的预算，要经过很复杂的手续，国家才能拨款。为了提高修史的质量、为抢救和保存珍贵的历史文献，我们也搞了一些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，这些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的大小就要看我们的财力而定了，现在还在调研阶段。总之，我们用修史来带动整理文献，用整理文献档案来提高修史的质量。我们拿到国家的钱一定用在刀刃上，绝不浪费，虽然我们没有经验，但一定要兢兢业业地花这个钱。

还有好多同志担心，很大的基础工程是否会影响和冲击主体工程。这一点请同志们放心，我们工作要分清主次，主体工程就是主体工程，别的工程不能来冲击主体工程，，我们首先要保证主体工程，用最适当的人才、最充足的经费来保证清史的写作，如有余力再搞其他的工程，不能因为其他工程而影响、冲击了主体工程。

现在清史编纂工程刚刚启动，要历时 10 年，意义重大，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我们讲要学习“三个代表”的重要思想，在先进的生产力方面有很多大工程，宇航员上天、三峡工程、青藏公路、南水北调，这样的大工程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。我想，清史编纂工程的上马，实际上也是体现了“三个代表”思想的内容，就是先进的文化方向，可以说，这个工程是落实“三个代表”思想的一个重要举措。我们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一定全力以赴，排除万难，完成党中央和国务院交给我们的任务。同时一定要诚心诚意地和全国史学界专家学者团结一致，同心协力来完成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。

2003 年 2 月 21 日